

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

鄢盛明 陈皆明 杨善华

运用两组测量赡养的变量，本文对不同的居住安排影响子女赡养行为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安排对子女在3个方面提供赡养的可能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即料理家务等日常活动，在婚后继续给予父母同样甚至更多的经济支持和情感体贴。其中，同住的居住安排下子女提供这3方面赡养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可能性最小的是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子女。据此，文章对目前正在变化中的家庭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未来相关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居住安排 赡养

作者鄢盛明，1965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皆明，1955年生，社会学博士，美国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金斯维尔分校助理教授；杨善华，1947年生，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80年代以来，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临近，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对未来家庭养老可能产生的影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居住安排是家庭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我国家庭结构从传统的子女与父母同住逐步向两代人分开各自独立居住的方向发展这一变化趋势，将会对子女赡养父母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很值得研究。本文试图利用有关调查资料，通过对不同居住安排下子女提供赡养可能性的讨论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

研究方法

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老龄研究中心和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合作项目“保定市老龄化及代际关系调查”。该项目对居住在保定市50岁以上的市民及其一位在市区的成年子女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样本规模分别为1002人和753人（有关样本的详细描述，参见Whyte, in press）。我们下面进行的各项分析使用的是其中子女样本的调查资料。由于在所调查的753名子女中，有22名父母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进行调查，为便于与父母样本配对后进行分析，在以下的分析中实际使用的子女样本规模为731人。

因变量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了两组不同的因变量。一组是关于子女对父母所提供的实际赡养，另一组是关于婚后子女赡养父母情况的变化。所有这些变量都反映了子女为父母提供各种赡养

的具体行为。

在调查中, 被调查的子女被问及他们是否在过去的一年里在身体照料、料理家务等日常活动及在现金和实物方面为父母提供了帮助。最后还问到他们是否为父母提供了除上述 4 种帮助之外的其他帮助。被访人对这 5 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第 1 组因变量。这 5 个变量中的头两个变量测量子女在日常生活方面对父母的支持。第 3 和第 4 个变量测量的是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第 5 个变量测量的是子女给父母所提供的其他各种可能的帮助, 包括感情上的体贴和闲暇时的陪伴等。对于所有这些变量, 如果子女提供了支持的话, 变量的值编码为 1, 否则为 0。

表 1 不同居住安排下子女向父母提供的支持

向父母 提供的帮助	居 住 安 排			总样本
	与父母同住	未与父母同住		
		住在父母 附近	住在离父母 较远处	
身体照料:				
是 (%)	25.9	28.4	23.0	25.9
否 (%)	74.1	71.6	77.0	74.1
家务料理等活动:				
是 (%)	67.8	58.5	44.7	58.6
否 (%)	32.2	41.5	55.3	41.4
现金帮助:				
是 (%)	43.0	44.6	37.9	42.1
否 (%)	57.0	55.4	62.1	57.9
实物帮助:				
是 (%)	55.6	68.8	69.3	63.3
否 (%)	44.4	31.2	30.7	36.7
其他帮助:				
是 (%)	17.5	11.4	8.5	13.2
否 (%)	82.5	88.6	91.5	86.8
个案数	309	218	200	731

资料来源: 1994 年中国保定市老龄化和代际关系调查。

第 2 组因变量包括两个变量, 其取值来自被调查的已婚子女对婚后自己给父母的情感体贴和经济支持是否减少了的看法。这一组因变量是对子女赡养父母行为的一种间接测量, 也是对第 1 组因变量的补充, 因为在第 1 组因变量中没有专门测量情感支持的变量。这两个因变量均编码为二分变量 (dichotomous variable)。实际的编码方案如下: 如果子女在婚后提供的经济支持或情感体贴没有变化或增加了, 变量值为 1, 如果支持或体贴减少了, 则变量值为 0。

上述因变量的描述统计分别见表 1 和表 2。

居住安排

为比较不同的居住安排特别是住在父母附近的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父母可能性的影响, 我们把居住安排分为以下 3 类: (1) 与父母同住; (2) 不与父母同住但每天或几乎每天都见面; (3) 不与父母同住且与父母不是每天或几乎每天都见面。把与父母分住的居住安排分成两种不

同的类型，是为了比较同住与两种分开住的居住安排下，子女赡养父母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差异^①。由于调查资料中没有分开居住的子女和父母在空间距离上的准确数据，作为替代，本研究使用父母和子女见面的频率来作为两者住处之间的大致距离。因为，可以想见，一般来说，那些每天或几乎每天都能与父母见面的子女在空间上住得离父母较近。对中国部分城市中分开居住的子女所做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距离是影响父母与子女见面频率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与父母住得较近的子女往往更可能与父母有更多的见面 (Bian, Logan & Bian, 1998)。

表 2 不同的居住安排下子女在婚后所提供支持的变化情况

子女婚后提供 支持的变化情况	居 住 安 排			总样本
	与父母同住	未与父母同住		
		住在父母 附近	住在离父母 较远处	
经济支持^a:				
没有变化或增加了 (%)	75.2	59.4	47.7	59.7
减少了 (%)	34.8	40.6	52.3	40.3
情感体贴^a:				
没有变化或增加了 (%)	88.5	82.7	66.7	78.7
减少了 (%)	11.5	17.3	33.3	21.3
个案数	157	219	197	593

资料来源：1994 年中国保定市老龄化 and 代际关系调查。

a 有关此变量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正文。

需要说明的是，那些不是每天或几乎每天都与父母见面的子女是否一定住在空间上离父母较远的地方则不能完全确定。因此，使用我们目前所创建的居住安排的变量，有可能导致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居住安排的作用被过高估计。另外，由于子女样本局限于保定市区，而市区并不太大，“较远”和“较近”的差别也不是太大，故有可能使“住在离父母较远处”这一类居住安排的作用被高估。

其他自变量

在本研究中，两组其他变量将主要用做控制变量。它们是：(1) 有关被调查子女特征的变量，以及 (2) 被调查子女父母特征的变量。具体地说，有关子女特征的变量包括性别、婚姻状况、是否有小孩、受教育水平和每月的收入；有关子女父母特征的变量包括年龄、性别与婚姻状况合成的变量，每月的收入以及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子女婚姻状况及是否有小孩可以看做是其生命周期的两个主要指标，而父母的年龄和婚姻状况则是其生命周期的一个大致的代表。经济收入则可以看做是测量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衡量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指标 (齐铤, 1998; Idler, 1997; Morgan et al., 1998)。父母对于赡养的需求与其生命周期、社会经济地位及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而子女的生命周期及其社会经济地位将会影响到其对父母赡养的投入。控制这些变量的作用有助于更好地分析不同居住安排的影

① 有些学者认为分开住但住在父母附近的居住安排并不一定会减少子女提供赡养的可能性，甚至还有学者指出，这种居住安排可以在很多方面起到与子女同住一样的作用 (王树新, 1995; Knodel et al., 1991)。

响。关于这些变量在同住和分开居住下的情况以及整个样本的情况与分析，限于篇幅，在此略去^①。

分析结果

表 1 描述了 5 个方面的赡养行为与居住安排之间相互关联的程度。分析结果表明，大约有 82% 的被调查子女至少为父母提供了 5 种帮助中的一种帮助（在表 1 中未列出）。子女所提供的最为常见的帮助是实物上的帮助。在身体照料方面，与父母同住和分开住的子女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在料理家务等日常活动和其他帮助方面，同住的子女为父母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比分开住的子女要大。在现金支持方面，同住的子女似乎比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子女更有可能给父母提供帮助，这一点他们与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似乎没有什么差异。但对于实物类的经济支持情况则正好相反，即分开住的子女比同住的子女更有可能给父母送各种物品和礼物。除了身体照料和现金支持以外，那些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提供各种支持的可能性，始终处于同住的子女以及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子女之间。

表 2 列出了子女对于婚后自己在经济和情感方面给父母的支持是否减少的估计及其与不同居住安排之间的关系。在 593 名已婚的子女中，多数人都表示婚后给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感体贴没有减少，其比例分别为 59.7% 和 78.7%。不同居住安排下的频数分布表明，同住的子女在婚后减少对父母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比分开住的子女要小；而在与父母分开居住的子女中，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其减少对父母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又比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子女要小。在婚后给父母的情感体贴方面，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子女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模式。

上述双变量的分析结果似乎表明，总的来看，同住的子女比分开住的子女有更大的可能性给父母以各种支持，而在分开居住的安排下，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又比住在较远处的子女更可能给父母以各种支持。

不同的居住安排对是否提供身体照料和日常活动支持的效应

表 3 列出了在不包括或包括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不同的居住安排对身体照料和家务料理等日常活动效应的估计值。模型 1 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回归，反映了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居住安排对是否提供这两方面支持的影响。模型 2 反映了在控制了子女的有关特征的影响后，居住安排对这两方面支持的效应。模型 3 则揭示了在同时控制了子女及其父母的有关特征的影响后，居住安排对这两方面支持的效应。

从居住安排对子女是否提供身体照料和家务料理等日常活动支持的效应来看，表 4 中的结果是不一致的。在身体照料方面，总的来看，不同的居住安排对子女为父母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在不控制任何其他变量时，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子女是否提供支持的可能性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当子女的特征被考虑进去时，和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子女相比，同住的子女更可能为父母提供身体上的照料 ($P < 0.5$)。然而，在模型 3 中，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子女是否提供身体照料的效应再次在统计学上变得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对子女在身体照料方面是否提供支持的可能性来说，父母的年龄是一个显著的预测变量。这似乎表明，模型 2 中所显

① 对此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见：Yan, Shengming, Jieming Chen & Shanhua Yang (in press), "The Effects of Living Arrangement on the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Martin K. Whyte (ed.), *China's Revolution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示的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子女在提供身体照料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有可能来自不同居住安排下父母的年龄差别。

表 3 不同居住安排对为父母提供服务帮助的效应分析：逻辑司提回归

	身体照料			家务料理等活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不同居住安排						
与父母同住	0.157	0.533 [*]	0.442	0.954 ^{***}	1.366 ^{***}	1.288 ^{***}
住在父母附近 （住在离父母较远处）	0.286	0.273	0.287	0.556 ^{**}	0.587 ^{**}	0.558 ^{**}
子女的特征						
性别：						
男		-0.640 ^{***}	-0.608 ^{**}		-0.706 ^{***}	-0.787 ^{***}
（女）						
婚姻状况：						
在婚		-0.131	0.035		0.305	0.236
（其他）						
是否有子女：						
有		0.661 [*]	0.181		0.074	-0.033
（没有）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初中）						
高中或职业学校		0.109	0.201		0.056	0.067
大专及以上		0.436	0.437		0.381	0.350
每月收入：自然对数值		0.074	0.047		0.053	0.045
父母亲的特征						
年龄：						
（50—59 岁）						
60—69 岁			0.629 ^{***}			0.057
70 岁及以上			1.247 ^{***}			0.978 ^{**}
性别和婚姻状况：						
守寡/离婚的母亲			-0.369			0.436
鳏居/离婚的父亲			-0.444			0.010
（在婚的夫妇）						
家庭收入：自然对数值			-0.085			0.115
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						
不太好/很差			-0.202			0.023
一般			0.024			0.063
（很好/较好）						
回归常数	-1.208 ^{***}	-1.920 ^{***}	-1.357	-0.212	0.638	-1.325
模型卡方值 (log likelihood)	1.6	25.8	42.6	26.4	50.887	60.3
自由度	2	8	15	2	8	15

+ p < .10, * p < .05, ** p < .01

注：括号中的类别为参照省略项（reference omitted categories）。

对于家务料理等日常活动来说，情形则全然不同。分析结果表明，同住的居住安排增加了子女在料理家务等日常活动方面帮助父母的可能性。在模型中未引入控制变量时，那些与父母一起居住的子女提供这方面帮助的可能性是那些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的 2.6 倍（ $e^{0.954} = 2.60$ ）。

与之相似,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提供这方面支持的可能性,与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子女相比,大约是后者的1.7倍($e^{0.556}=1.74$)。居住安排的效应在子女特征的效应被控制以后进一步加大。与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子女相比,与父母同住和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提供这方面帮助的可能性分别为前者的3.9倍和1.8倍($e^{1.366}=3.92$,和 $e^{0.558}=1.75$)。而当父母的特征效应被控制后,居住安排的效应仍然很强,并继续在统计上呈显著性。这似乎说明,不同的居住安排对子女在家务料理等日常活动方面为父母提供帮助的较强效应,既不受父母也不受子女个人特征的影响。

显然,不同的居住安排对家务料理等日常活动的强大效应是可以预料的。然而,不同的居住安排对子女是否为父母提供身体照料的可能性没有影响的结果,似乎有点出乎意料。其中的原因可能非常复杂。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父母在身体照料方面的需求一旦发生,就显现出刚性的特点,于是,子女们无论是否与父母同住,都前来提供帮助。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所调查的子女都在市区,且市区也不是特别大,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了不同居住安排之间差异的缩小。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做进一步的讨论。

不同的居住安排对经济支持和其他帮助的效应

表4给出了不同的居住安排对经济支持和其他帮助的效应的估计值。对现金方面的支持来说,与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居住安排相比,模型1中与父母同住的居住安排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而当子女的个人特征变量被加入到模型中后,其效应仅具有边际上的显著性(Marginally significant)($p < 0.10$)。但是,当父母和子女的特征变量都加入到模型之中后,居住安排的效应进一步增加,并在统计上呈显著性($p < 0.05$)。这说明,当父母和子女经济状况的影响被剔除之后,同住的子女给父母现金帮助的可能性比分开居住的子女要大。

对于实物方面的经济支持,模型1的结果清楚地表明,和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子女相比,同住的子女给父母送日常生活用品等实物的可能性要小得多(-0.593)。但是,当子女特征的效应被考虑进去后,差异就基本上消失了。很显然,这是由于子女的性别和收入等变量解释掉了居住安排的效应。换言之,我们在模型1中所看到的较强的效应,主要是由于以下事实造成的,即儿子和收入较低的子女往往更倾向于与父母一起居住。而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如风俗习惯、购买能力等),不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女儿和经济收入较高的子女,往往有更大的可能性送给父母各种礼物或物品。这是符合情理的。当父母的有关特征引入方程后,居住安排的效应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表明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子女是否给父母提供实物支持的可能性,不受父母有关特征的影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是现金还是实物方面的经济支持,与有配偶的夫妇相比,丧偶或离婚的母亲更可能得到子女的支持。而对于鳏居或离婚的父亲,即使在收入上的影响被剔除之后,他们从子女那里获得这方面支持的可能性也最小。这一模式与对天津和上海的研究中,子女为父母提供日常活动支持的有关结果是完全一致的,在美国的丧偶老年人中也存在类似的性别差异(Logan & Bian, 1998)。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一情况与母亲在晚年的日常生活中能比父亲给子女提供更多的实际支持有关。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受成长早期社会化过程的影响,子女与母亲之间保持着比与父亲之间更强的联系。

对于其他方面的帮助,同住的居住安排显然有助于增加子女为父母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同住的子女为父母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大约是那些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子女的2倍,而住在父母附近和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子女之间则不存在差异。不过,当有关子女和父母特征的控制变量进入方程后,同住的居住安排效应仅具有边际上的显著性。

表 4 不同的居住安排对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其他方面支持的效应: 逻辑司提回归

	现金帮助			实物帮助			其他方面的支持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不同居住安排									
与父母同住	0.213	0.428 ⁺	0.595 [*]	-0.593 ^{**}	-0.073	0.041	0.824 ^{**}	0.645 ⁺	0.698 ⁺
住在父母附近 (住在离父母较远处)	0.278	0.243	0.216	-0.025	-0.015	0.077	0.327	0.328	0.421
子女的特征									
性别:									
男 (女)		0.036	-0.023		-0.547 ^{**}	-0.625 ^{***}		0.515 [*]	0.466 ⁺
婚姻状况:									
在婚 (其他)		0.470	0.494		0.221	0.271		-0.977 [*]	-1.016 ⁺
是否有子女:									
有 (没有)		-0.369	-0.587 [*]		0.384	0.186		0.928 [*]	0.720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初中)									
高中或职业学校		-0.143	-0.084		0.003	0.056		0.599 [*]	0.907 ^{**}
大专及以上		-0.478 [*]	-0.396		-0.081	-0.050		-0.026	0.344
月收入: 自然对数值		0.354 ^{***}	0.370 ^{***}		0.167 ^{***}	0.155 ^{***}		0.027	0.026
母亲的特征									
年龄:									
(50—59 岁)									
60—69 岁			0.198			0.558 ^{**}			0.513 ⁺
70 岁及以上			0.680 [*]			0.722 [*]			0.571
性别和婚姻状况:									
守寡/离婚的母亲			0.683 ⁺			0.981 [*]			-0.768
鳏居/离婚的父亲 (在婚的夫妇)			-1.376 [*]			-0.715			0.953
家庭收入: 自然对数值			-0.384 ^{**}			0.013			0.018
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									
不太好/很差			0.258			0.261			0.617 ⁺
一般 (很好/较好)			0.145			0.206			0.389
回归常数	-0.495 ^{***}	-2.482 ^{***}	-0.370	0.816 ^{***}	-0.388	-0.880	-2.376 ^{***}	-2.999 ^{***}	-3.918 ^{**}
模型卡方值 (log likelihood)	2.1	43.2	71.3	13.8	48.7	69.7	9.5	26.3	39.0
自由度	2	8	15	2	8	15	2	8	15

+ p < .10, * p < .05, ** p < .01

注: 括号中的类别为参照省略项 (reference omitted categories)。

总之, 不同的居住安排对现金和实物方面的支持以及其他帮助的效应, 远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没有引入控制变量前, 居住安排对现金支持没有显著的效应; 在控制了子女和父母有关特征的影响之后, 居住安排对现金支持的效应在统计上呈显著性, 表明同住的子女比那些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子女有更大的可能性为父母提供现金支持。虽然对居住安排和实物支持的双变量分析表明, 前者对后者有负的影响, 即分开住的子女更可能送礼物和其他物品给父母, 但在控制

了子女和父母的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后，这一效应基本上消失了。另外，也有证据表明，与父母同住的子女比住在外面的子女为父母提供了更多的其他帮助。

表 5 不同居住安排对婚后自己认为的为父母提供支持的变化情况的效应：逻辑司提回归

	经济支持的变化			情感体贴的变化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不同居住安排						
与父母同住	1.199 ^{***}	1.072 ^{***}	1.087 ^{***}	1.351 ^{***}	1.302 ^{***}	1.447 ^{***}
住在父母附近 （住在离父母较远处）	0.470 [*]	0.433 [*]	0.564 ^{**}	0.868 ^{***}	0.822 ^{***}	0.862 ^{***}
子女的特征						
性别：						
男		0.359 [*]	0.390 [*]		0.021	-0.015
（女）						
是否有子女：						
有		0.075	-0.286		0.105	-0.040
（没有）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初中）						
高中或职业学校		0.307	0.408		-0.089	-0.009
大专及以上		0.109	0.078		-0.397	-0.325
每月收入：自然对数值		-0.037	-0.026		0.031	0.035
父母的特征						
年龄：						
（50—59 岁）						
60—69 岁			0.267			0.466 ⁺
70 岁及以上			0.555 ⁺			0.479
性别和婚姻状况：						
守寡/ 离婚的母亲			0.559			-0.471
鳏居/ 离婚的父亲			-0.092			-0.901
（在婚的夫妇）						
家庭收入：自然对数值			0.113			-0.056
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						
不太好/ 很差			-0.051			0.047
一般			0.029			-0.385
（很好/ 较好）						
回归常数	-0.091	-0.240	-1.057	0.693 ^{***}	0.570	0.832
模型卡方值 (log likelihood)	28.1	33.3	42.0	27.9	27.4	37.2
自由度	2	7	14	2	7	14

⁺p<.10, *p<.05, **p<.01

注：（1）括号中的类别为参照省略项（reference omitted categories）。

（2）关于婚后经济支持和精神体贴的变化的编码为 1=无变化或支持更多，0=其他。

（3）以上分析的个案数为 593。

不同的居住安排对子女婚后给父母的支持是否变化的效应

表 5 中的分析结果总结了不同的居住安排对评估子女婚后给父母的支持是否减少的效应。这些结果令人信服地表明，与父母同住或住在父母附近的已婚子女，远比那些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已婚子女更可能声称，他们婚后提供给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感体贴没有变化，甚至比结婚前还增加了。当有关子女和父母特征的控制变量进入方程后，居住安排始终存在很强的效应并且在统计上呈显著性。例如，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与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子女相比，同住和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婚后给父母的经济支持没有减少的可能性分别为前者的 3 倍和 1.8

倍。同样，对于婚后给父母的情感体贴没有减少的可能性，上述两两相比的结果分别为前者的 4.3 倍和 2.4 倍。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子女结婚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后，同住的居住安排，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住在父母附近的居住安排，帮助了已婚子女继续与父母保持牢固的联系，因而有利于他们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感体贴的继续。但是，与情感支持不同的是，儿子在婚后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比女儿更可能保持不变，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规范仍然在起作用。在这一规范的影响下，结了婚的儿子比嫁出去的女儿有更大的在经济上赡养父母的责任。

需求，居住安排与子女赡养

在不同的居住安排与子女赡养的关系中，子女对父母赡养需求的感知是一个重要因素。为此，我们特地对居住安排、子女对父母赡养需求的认知以及子女所提供的赡养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

老年人的需求经常被认为是子女是否提供赡养的决定因素之一 (Logan et al., 1998; Lee et al., 1995)。但是，只有当子女有提供支持的意愿时，父母的需求在促使子女提供支持方面才是有效的。同时也只有当父母的需求被具体化为子女所认知的需求时，它才可能成为子女提供支持的动因。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的需求被子女内化为提供赡养的动机。而另一方面，父母对赡养需求的缺乏也有可能成为子女拒绝提供支持的一种借口。因此，对父母赡养需求的认知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通过这一概念，许多其他的变量对子女的支持产生影响。那么，居住安排对子女感知父母的赡养需求是否有影响呢？

调查中，在回答是否为父母提供某一种支持前，被调查的子女首先被问及其是否认为自己的父母需要这方面的帮助。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我们分析中子女所认知的父母需求的变量。如果子女认为父母需要这方面的帮助，编码为 1，如果认为不需要，则编码为 0。

统计结果表明，居住安排并不影响子女对父母赡养需求的认知。不同的居住安排对子女在身体照料、家务料理、现金和实物支持等方面赡养需求的认知的回归系数，没有一个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统计学上的证据表明，不同的居住安排改变了子女对父母赡养需求的认知。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子女所认知的父母在每一个方面的赡养需求，都是子女是否提供这方面赡养的极好的预测变量。考虑到不同的居住安排和子女所认知的赡养需求二者之间缺乏联系，这一结果表明，子女的认知并不是解释居住安排对于子女赡养效应的一个重要机制。

此外，统计结果还表明，即使在子女这种认知的效应被控制之后，不同的居住安排对子女在 4 个方面赡养父母的影响方式，也与我们前面所发现的情况极其相似^①。这再次表明，居住安排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子女所认知的父母对于赡养的需求。

讨论和结论

运用两组测量赡养的变量，本研究试图查明，在分别控制了子女及其父母的特征等有关因素的影响以后，不同的居住安排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子女为父母提供赡养的可能性。结果表明，在家务料理等日常活动以及在婚后给父母的经济和情感支持保持不变等方面，不同的居住安排对子女行为的可能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同住的子女为父母提供家务料理等活动的可能性

^① 限于篇幅，有关这三方面的统计结果在文章中没有列出。

最大，婚后给父母的经济和情感支持保持不变甚至增加的可能性也最大；其次是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可能性最小的是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子女。但同时我们的分析结果也表明，在其他方面如身体照料以及现金和实物帮助等更为“具体的”赡养上，不同的居住安排对子女是否提供赡养的可能性，并不存在特别确定的影响。研究结果还表明，子女对父母赡养需求的感知状况不受居住安排的影响。

据此，我们有以下几点发现。首先，在保定市这类地处中国内地的中等城市中，居住安排对子女在不少方面是否为父母提供赡养的可能性有着显著的影响。以往的不少研究在对家庭养老的有关因素进行描述和双变量的分析时，曾提出家庭的居住安排是影响家庭养老的重要因素的假说（参见 Kendig et al., 1992）。本研究运用多变量分析技术，在控制了子女和父母的特征对赡养提供的影响以后，证实了居住安排对子女在一些方面是否赡养父母的可能性存在着净效应。这不仅在理论上为进一步认识居住安排的作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经验基础，也为今后有关家庭养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我们的第二个发现是，正如有些观点所争辩的那样，本研究证实了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的确并不等于子女完全抛弃了赡养父母的责任。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城市中与父母分开居住的子女也为其父母提供着各种帮助，特别是那些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为父母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更大。看来，在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的情形下，住在父母附近对家庭养老来说可能确实是一种比较有利的选择。这一结果为国内学术界提出的“分而不离”的赡养模式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

本文的第三个发现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同住的居住安排相比，住在父母附近的居住安排，在子女为父母提供支持的可能性上，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本文的第四个发现是，不仅不同的居住安排对子女在某个方面赡养父母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而且同一种居住安排对子女在不同方面赡养父母可能性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总的来看，与父母同住的居住安排对子女在家务料理等日常活动的照顾、其他方面的帮助以及婚后对父母在经济和情感上的支持保持不变的可能性等方面影响较大，而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则不是特别明显；住在父母附近的居住安排，则对子女在家务料理等日常活动的照顾、婚后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保持不变等方面的可能性影响较大，而对提供其他方面支持的可能性，影响也不是特别确凿。

那么，以上发现的意义是什么呢？随着家庭居住安排从同住向分开居住的方向发展，总的来看，子女赡养父母的可能性将会减小。而在目前中国城市中子女仍是家庭养老的主要支持来源的情况下，居住安排的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家庭赡养的削弱。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在分开居住的子女中，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为父母提供这样或那样的支持仍然有较大的可能性，而且在我国城市地区的居住安排中，相当数量的子女住在离父母较近的地方，预计在未来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并不会大规模出现子女与父母在空间上的隔离（参见林戈，1999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居住安排的变化对中国城市家庭养老的削弱在目前可能还并不是特别严重。此外，由于不同的居住安排对子女在不同方面为父母提供赡养的可能性影响不同，因此，可以预期，在居住安排从同住向分开居住发展的过程中，子女在不同方面提供的赡养受到削弱的程度可能也是不同的。总的来看，似乎料理家务等日常活动的照顾，以及在婚后对父母在经济和情感上的支持继续保持不变等方面被削弱的可能性较大，而其他支持被削弱的可能性，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在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中，有关中国城市家庭居住安排的变化对子女赡养父母的影响，有必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要全面准确把握居住安排及其变化对未来子女赡养的影响,必须使用全国性的城市样本资料进行研究。其次,由于居住安排的变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运用横截面的调查资料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为了更为准确地预测居住安排的变化对子女赡养的影响,今后也有必要运用追踪调查的资料,具体跟踪每一种居住安排在不同时点上的变化对子女赡养的影响。第三,在今后的研究中,还有必要从父母所报告的子女提供赡养情况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说,父母所报告的情况对评估子女赡养行为的现状可能更有意义。第四,在未来的研究中,除了要研究居住安排对子女提供赡养的可能性的影响外,也要研究其对子女提供赡养数量的影响,以利于更为确切地评估居住安排变化的影响。最后,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测量分开居住的女儿与父母之间实际的空间距离时,最好使用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所用的出行方式到达父母住处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的测量单位可能比实际的物理距离以及通过居委会、街道、城区等行政架构来测量会更为精确和有效。

参考文献:

- 齐钜:《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老年人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林戈、鲍曙明、孙晓明:《建立以家庭和社区服务相结合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载《人口研究》1999年第2期。
- 王树新:《论城市中青年人与老年人分而不离的供养关系》,载《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3期。
- Bian, Fuqin, John R. Logan and Yanjie Bian, 1998,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Proximity, Contact, and Help to Parents." *Demography*, Vol. 35, No. 1.
- Idler, Ellen L. and Yael Benyamini. 1997, "Self-Rated Health and Mortality: A Review of Twenty-Seven Community Studie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8: 21-37.
- Kendig, Hal L., Akiko Hashimoto and Larry C. Coppard (ed.), 1992,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nodel, John and Nibhon Debavalya, 1992,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Asia: An Introduction."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Vol. 7, No. 3.
- Knodel, John, Napaporn Chayovan & Siriwan Siriboon, 1991, *Familial Support and the Life Course of Thai Elderly and Their Children.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lderly in Asia*, Research Reports No. 91-12.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Lee, Yean-Ju, William L. Parish, Robert J. Willis 1994,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aiw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9.
- Logan, John R., Fuqin Bian & Yanjie Bian. 1998,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Urban Chinese Family: The Cas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Social Forces* 76 (3): 851-882.
- Morgan, Leslie and Suzanne Kunke, 1998, *Aging: The Social Context*.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Pine Forge Press.
- Yan, Shengming, Jieming Chen & Shanhua Yang (in press), "The Effects of Living Arrangement on the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Martin K. Whyte (ed.), *China's Revolution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rtin K. Whyte (ed.) (in press). *China's Revolution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本文责任编辑:冯小双]

which consist of the following: 1. Setting up a multi-tiered capital system; 2. Optimizing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3. Improving listed companies; 4. Adding new monetary varieties; and 5. Accelera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stock market.

(9) An Analysis of Corruption in Terms of Economic Reason and Expected Utility

Zheng Liping °91°

In the context of rational man and unbalanced information, individual corruption occasionally arises as a result of personal calculations of gains and losses within the limits of partiality and institutional restraints. Based on a balanced study of individual economic behavior and corruption that results from money-power exchanges such as bribery, the author shows the impact of the prosecution rate in corruption cases, the forcefulness of punishment, the gains from such corruption and the salary levels of those involved in corruption. He argues that the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corruption is to fight it more forcefully, rapidly establish the new order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increase the salary of public servants.

(10) Challenges of the INTERNET to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s

Xiao Yongping Li Chen °100°

The INTERNET has an intrinsic relationship with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s. On the basis of concrete analyses of legal conflicts that frequently occur on the INTERNET with regard to international tor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commerce, the authors focus on legal relationships on the INTERNET and discuss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TERNET to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s in terms of related laws, the methodology of the choice of laws, applicable laws, jurisdiction, service and taking evidence abroad.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ir own views on the solution to these challenges and review the opinions of foreign scholars.

(11) The Consciousness of Authority of the Staff and Workers in an Enterprise and Its Influence 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Cai He °119°

The legitimacy of authority in an enterprise is based on the employees' identification with power.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following: Firstly, the employees' identification with managerial autho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value rationality, whereas the employee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managerial authority in private enterprises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econdly, the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ose in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their consciousness of authority.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more subject to the authority based on value rationality while employees in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more subject to the authority based 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irdly, the difference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authority of employees is shaped by their different "consciousness of rights" which is linked to different ownership.

(12) The Effects of Living Arrangements on Children's Support of Their Parents

Yan Shengming Chen Jieming Yang Shanhua °130°

Using two sets of variables as measurements of support,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living arrangements on children's support for their parent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living arrange-

ment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hildren's support of their parents in three ways: daily activities such as doing household chores for the parents, continuance of economic support, and other considerations. Those who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are most likely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ir parents in all three aspects, those who do not live with their parent but who live close to them come next, and those who live far away from their parents are least likely to do so.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urrent changing living arrangements on family support in China and mak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field.

(13) **On Anthony Smith's Exposition of "Nation"**

Ma Rong °141°

"Nation" has become a popular word in China in both academic circle and social lif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However, there has been debate over the understanding and translation of this Western term among scholars. Anthony D. Smith, a sociologist teaching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 has published many books and articles on the concept of "nation" and his opinions have been very influential among Western scholars. In his book *National Identity* published in 1991, Smith discuss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is concept and the problems in its application. The author introduces Smith's views, and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is concept. The author makes further discussion based on his own research experiences and suggests translations for several key terms for future discussion.

(14) **Literary Theory: Towards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Qian Zhongwen °152°

In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 two "dislocations" moving in opposite directions occurred in research on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and foreign (mainly Western) countries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se deprived both sides of common ground for fruitful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From the 1980s onwards, China and the West began to have an integrated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o adopt a common approach to research topics and issues. A tru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sides gradually began.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provide the only road for the literary theory of both sides to survive and achieve innovations. In the course of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each side should act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China must create a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this does not mean advocating narrow 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isolation.

(15) **The Formation of the Classical Artistic Spirit in China**

Gao Xiaokang °160°

"The classical artistic spirit", which is similar in meaning to "classicism", is an artistic concept in which the classics are taken as a model, and the inheritance of aesthetic ideals and the permanency of the value of art are emphasized. The classical spirit of art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the national art tradition and is importan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formation of the classical spirit of art underwent a long process. From the pre-Qing period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developed from the early didactic approach to concentration on the model of literature and the law of creation. He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lassical spirit of art in China.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model of literature matured. Th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taken as a model and therefore a concrete aesthetic model of literature came into being. A consciousness of learning from the model in the spirit of aesthetics was formed, namely, the consciousness of "reaching the acme of perfection" by learning from the "law of the model". By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lassical literature had gradu-